

社

会

(1982-1999)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

变迁录

焦润明等 编著



沈阳出版社

SHENYANGCHUBANSHE

文

化

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焦润明 张春艳 王家会
张晨怡 李相珍 陈笑迎 编著

沈阳出版社

第三卷

(1982 ~ 1999)

1982 年

1982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召开,邓小平致开幕词,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产值翻两番,即从 1980 年的 7100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28000 亿元,从而达到“小康”水平。

同年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总指针的新宪法。

鉴于目前领导班子高龄化问题,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省部级正职不准超过 65 岁,司局级不准超过 60 岁,从而为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铺平了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日趋增多。

在社会文化方面,进一步呈现繁荣的局面,影片《人到中年》引起共鸣,女排精神鼓舞人心,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

百业待兴,人才紧缺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村、城市经济都迅速恢复和发展,到80年代初,人才短缺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除了工作在工业、农业等部门的专业能手缺乏外,知识型人才短缺更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从建国到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共培养各类大学生三百二十七万人,他们按阶段大致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1950年至1963年入学的二百万大学毕业生,他们和解放前毕业及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组成了我国具有大学水平的一支知识分子队伍,是活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第二梯队是1964年以后入学至1976年以前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一百二十多万人,他们有的只学了一些基础课,有的连基础课也没学好。第三梯队是1977年以后考试入学的学生,他们受到了正规的、严格的教育,将是一支有一定水平的力量,1982年以后才会陆续毕业。

造成人才短缺首先是因为第一梯队的年龄大多在四十至五十五岁。他们精力最旺盛最利于提高业务水平的时期被“文化大革命”无情占去,一部分人的业务日趋荒疏,而且“这些人的健康情况也很不理想。他们的青壮年长期处在这种条件下,很难对事业全力以赴”^①,他们急需能顶替自己的后继力量。

而第二梯队后继力量不足又是造成人才紧缺的另一重要原因。第二梯队的人实际上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工农兵大学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十几年里,大学教育几乎荒

① 钟琪:《人才问题的紧迫感》,1982年1月10日《光明日报》。

废,尤其 1966~1969 年四年没有招收一名大学生。这一年龄段的人只有少数人坚持自学,靠个人钻研才没有荒疏学业。这些人的数量太少,很难完全承担起他们本来应该担当的骨干支撑作用。第三梯队的新时期知识分子还未完全毕业。青黄不接的人才现状给各部门的发展带来困难。

为此,人们想到各种办法克服这种不利局面。比如延长第一梯队人才的使用时间,让他们一代人挑一代半人的担子,另外为第三梯队人才早日成为骨干创造机会,从而克服第二梯队的人才断层。

人才少,人尽其才就更显得重要了。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观念还基本停留在旧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中,人才自身也难以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问题是怎样流动。自发地流动,自己去找工作?那将引起社会混乱,是不可取的。我们只能有计划地,由国家通观全局,合理安排”。^①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只有人才发挥主动性,合理地自发地流动,才能最大效率地施展才华。国家安排与自发流动相比存在不少缺点。

现代国际间的竞争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才的竞争,吸取历史教训的中国人更应当珍惜人才资源,充分利用人才为各项建设服务。

经济领域犯罪问题开始严重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增强国家实力,追赶发达国家的构想,到此时已经经历了几年的实践检验,一切均表明是正确的。中国经过这短短几年的发展,在各方面建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① 钱学森:《社会主义的人才系统工程》,《红旗》1982年第2期。

但同时,事情还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法律不够健全有力,“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民主作风受到严重冲击,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滋长,极端个人主义膨胀,在经济建设不断升温的时代,大肆以权谋私,各种不正之风迅速盛行,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阻碍。这些不正之风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假公济私,都是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现象。不正之风涉及各个领域,尤其以经济领域腐败、犯罪最多。

“在当前反腐败的斗争中,被糖衣炮弹打倒的干部,有些是属于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但是也确有极少数老同志,这些老同志过去没有被敌人的武力征服,也没有被“四人帮”的镇压征服,党外反革命的暴力,党内反革命的暴力都没有把他们征服。但在近几年同国际资本主义的交往当中,却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打倒了,这难道还不发人猛醒吗?①”

从被查出处理的案例中可见,工作人员、各级干部在经济领域的犯罪并非一地区一部门,犯罪人员的身份从高到低,多种级别。上自中央部委一些负责人,下至地方领导。如本年8月,国务院作出决定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其原因在于,“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杨义邦同志,在1978年下半年和1979年,在对外经济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不顾有关部门多次提供的材料和提出的劝告,在国外活动不通过我国的有关驻外机构,一再违反纪律,听从外商的摆布,屈从外商的要求,变相受贿索贿,违犯国家保密规定,给国家的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② 基层干部腐化,违法犯罪事件更为屡见不鲜。如河南省宝丰县委书记李振华,利用职权,倒卖曲酒,收受贿赂,侵吞国家和集体财物,共达1.1万余

① 《对外开放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国务院作出决定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198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元。^① 还有中共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海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王仲,利用职权侵吞大量缉私物资,收受申请赴港人员贿赂。在他主管海丰县缉私工作期间,先后在海丰县和汕尾镇、汕尾镇公安分局等缉私物资仓库,无偿索取大量缉私物资,计有:各类手表 300 多只,收录机 19 部,各种布料 400 多米,各式衣服 100 多件,以及贵重药品、日用品、电风扇、自行车等一批物资。他还收受赴港人员贿赂的电视机 6 部,收录机 2 部,电冰箱 1 个。

领导者的腐化,其后果决不仅仅是垮掉他本人,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他们直接影响下,常常造成他们所在部门、单位乃至一个地区风气败坏。“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前人留给我们这样的教训已经很多,在加速经济建设,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的步伐,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之间拉帮结派,靠造反夺权起家,诬陷迫害群众、干部,打、砸、抢、烧,严重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文革”结束以后,有一部分人仍然混杂在党和政府各级岗位上,对党和国家形成了严重的隐患。

为此,中共中央于 1982 年 12 月 30 日发出了《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

^① 《原河南省宝丰县委书记李振华利用职权倒卖曲酒,收受贿赂,侵吞公物,被开除党籍依法逮捕》,1982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子这“三种人”不可以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的危險,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接着,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把清理“三种人”作为新时期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指出,区分“三种人”的根据,是其对党和人民造成的实际危害,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确定是否“三种人”要既严肃又慎重。对“三种人”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对开除了党籍的人,凡是还可以当干部的要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不能当干部的,也要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给以出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改造,帮助他们进步。

在这次运动中,被清理出党和政府领导干部队伍的有40多万人,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纯净度。

我国培养出第一批博士

1982年6月1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马中骐、谢惠玉、赵林城、白志东已分别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冯玉琳也通过了论文答辩,准备提请中国科学院技术部授予工学博士学位,国内各媒体争相报道。

“举行博士论文答辩,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也是我国自

古以来的第一次。一些参加这项工作的专家和教授认为,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并培养出有较高水平的博士,说明我国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已经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这批博士的才学与成绩有口皆碑,他们的经历、意志更催人奋进,马中骥等六位博士大都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考上研究生的。他们所走的路用冯玉琳的一句话是“弯弯曲曲的路”,而且崎岖坎坷,布满荆棘。

这些博士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都是在“文革”期间中断了学业。马中骥是兰州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文革”期间学业中断,被迫回到兰州大学做教师。谢惠民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动乱中,学数学的分配工作没人要,不得已到无锡一个工厂里当了资料翻译。从小爱好数学的冯玉琳,1968年以前已是武汉大学数学函数论专业的研究生,因十年动乱,后来到湖南一个山沟里的农业机械厂当了工人。

李尚志、赵林城、白志东从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便走向社会,干的基本上是所学非所用的工作。赵长林到河北一个山沟里的工厂当工人,后又搞收发和搬运工作。白志东在新疆一个农场先后当过拖拉机驾驶员、食堂会计、维修工、汽车司机、技术员。六位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李尚志,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数学、物理竞赛均获优胜,在科技大学时也名列前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毕业后有机会继续深造,但在那个年代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大学毕业后,他到四川农村一所小学当教员,一干就是四年。

在那种年代,身处那种环境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冯玉琳一面在工厂当翻砂工,一面坚持自学,白天干活,晚上学习,后来又有机会参与计算机设计工作,并在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中骥在兰州大学教书的同时,抓紧一切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完成了关

于弱电统一理论方面的论文,在量子化学方面也做出了成绩。谢惠民在大学期间就钻研稳定性理论和控制论,大学毕业时已能阅读英、俄、德三种文字的专业书刊,后来到工厂当翻译,又自学了法语与日语,翻译了美、日、法、德、俄等五种文字的大量科技资料。李尚志在山村当教师时,同时担负初中班的数学、理化和英语教学工作,在搞好本职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自学了微分课程和复函数,自学了运筹学、普通化学和分析化学。白志东干什么学什么,不仅学会了开拖拉机、开汽车,而且学会了修理柴油水泵和汽车。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常常白天工作,夜间从晚上九点钟起一直读书到凌晨四点钟,最后以专业课和基础课全优的成绩,考取了科技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

这批博士有一个共识:如果“四人帮”不垮台,自己也许永远所学非所用,现在全国上下对我们寄予了很大希望,我们已经失去了十年的时间,为了将来能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现在应抓紧时间多学一些,把失去的时间补上。基于这种想法,他们在做研究生的三年里,平时很少在夜间12点钟以前睡觉,不分昼夜地刻苦攻读。有的人在一年里就读完和通过了研究生课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攀登,这批研究生在科学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马中骐的论文《SV(H)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专家认为他对方法论的运用有独到之处,得到的结果是有意义的,与外国类似的工作相比,这篇论文的结果更为严密和完整。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谢惠民在论文中,以多机电力系统的机组间所发生的共振现象为背景,建立了一种共振理论。专家们认为,这样的理论在数学上难度比较大,这项研究工作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得较好。研究生冯玉琳的论文讨论了当前国际计算机科学家重视的一个主要问题。专家们认为,这篇论文是对程序逻辑这样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的重要贡献,采用的方法是新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另外三人的论文也达到

了国内外博士论文的水平。

宣传婚姻道德和精神文明

当来自外界的和社会的压力变小,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之时,婚姻家庭此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此,宣传部门加大了关于婚姻道德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力度。

胡耀邦同志对这一时期的婚姻家庭问题做了如下批语:

家庭仍是我国社会的细胞,我们对婚姻家庭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的发展。对婚姻家庭问题,不但要用正确的法律去约束,还要靠正确的社会舆论去引导。社会舆论,即社会的道德风尚力量,比起法律来,大得不可估量。建议妇联、共青团、工会、文化团体、教育界把这件事抓起来,抓它十来年,出现一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家和睦,人人相爱的新局面。^①

这一时期婚姻家庭生活总的看来是好的,但也存在和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现象依然存在。虽然《婚姻法》中早已明确规定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行为,但是在一些偏僻地区、一些头脑愚顽人的思想里,“父母之命”还在左右着年轻人的婚姻生活。

另外,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较以前大为提高,手里有了钱,一些地方出现了婚礼大操大办的现象。“婚事大操大办实质上是旧社会以钱财、地位为联姻条件的陈规陋俗在婚礼上的一种

① 《胡耀邦同志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批语》,《新华日报》1982年第2期60页。

表现,这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不相容的。婚事大操大办会给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亲友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会影响婚后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和睦,对新婚夫妇十分不利。”^① 报纸也呼吁“结婚是个人生活中的喜事,用什么方式操办,不仅关系到婚后的家庭生活,也影响社会风气。按照婚姻法规定,取得结婚证,就算正式夫妻,举行不举行仪式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有人愿意举行一定的仪式,大家是赞成的。但是我们提倡本着文明、节俭、愉快的精神,量力而行,切不能比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②

除此之外,这一阶段由于社会舆论压力减轻,离婚现象有明显增加。由于对外开放,同国外接触的机会增多,一些人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还有一些家庭由于双方中某一方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有的人确感两人难以沟通或是不乏其中一方喜新厌旧,执意摆脱原来配偶和家庭。对此,有关人士表示“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必要的补充。特别是在我国还没有完全消灭包办买卖婚姻的情况下,婚姻法作离婚自由的规定,更有必要。但决不能以这种规定为借口,喜新厌旧,朝三暮四,动不动就闹离婚,把离婚自由绝对化。婚姻本身就有义务的约束,有道德的要求。……结婚不单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结合会产生第三个新的生命,就涉及到下一代的问题,就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轻率离婚,只顾自己,不管他人,是同社会公德不相容的利己主义的表现,应当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谴责”。

中央宣传部和全国妇联1月在北京组织了国家机关、北京市、新闻单位等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座谈在婚姻家庭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时,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应当“大力宣传和提倡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宣传无产阶级的婚姻恋爱观,批判那种离开社会主义

① 廖井丹:《婚姻道德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华日报》1982年2期60页。

② 《祝愿家庭和睦人人相爱》,1982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道德,离开对家庭、子女的义务,离开社会责任追求所谓个人的幸福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他们还建议要教育“第三者”,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破坏他人家庭是一种罪过,是极不道德的”。^① 他们提出应当以周恩来和邓颖超相处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八互”为典范,提倡夫妻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帮、互让、互谅、互慰。

婚姻质量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与否,也关系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生活,美满和睦的家庭人人向往。只要加以正确引导,发扬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婚姻道德与社会秩序。

女排精神振奋全国

1981年,中国女排在当年的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全国上下为之振奋,紧接着1982年女排在利马再次夺得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蝉联桂冠,奠定了在排球比赛中的领先地位。

女排的胜利令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深感自豪,海内外华人共享荣耀。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全国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体育运动事业很不发达,中国虽是一个大国,但还未摆脱体育弱国的名称,此时,作为“三大球”之一的排球率先翻身,连夺冠军,确实难能可贵。

国务院特发电文祝贺中国女排的胜利,赞扬她们“为祖国、为人民争得了荣誉”,“表现了遇强不惧、百折不挠、团结一致、顽强拼

^① 《中宣部、全国妇联约请二十六个单位负责人座谈婚姻家庭问题》,198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搏的精神,对全国人民又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并且“希望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都能以这种精神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努力奋斗”。^①

在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女排举行的庆功会上,宋任穷再次向女排祝贺,他说:女排两次带头冲上去,对全国人民干四化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推动。各条战线的人们都在思考,女排能够攀上世界高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搞上去?女排能够排除艰难险阻夺取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愤图强,全面打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现在,全国人民在庆贺女排胜利的同时,都在认真学习女排奋不顾身,为祖国荣誉而英勇拼搏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学习她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脚踏实地战胜各种困难的苦干实干精神;学习她们越是形势险恶,越是团结战斗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优良风格。女排精神必将在我国四化事业中,在人民心坎中,开花结果!^②

这种力争上游、顽强拼搏、团结战斗的作风被誉为“女排精神”,各行各业都以她们为目标,争创自己的工作佳绩。“中国女排”的胜利,打出了一股气来,这就是中国人民坚忍不拔,奋斗不止,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恢宏志气。我们开创体育工作新局面需要这样一股气,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更需要这样一股气。”^③

体育比赛确实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深化爱国主义情绪。但当年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一场体育竞技比赛。女排的荣誉,增强了民族自信心,这对于一个国

① 1982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② 《国家体委和体总会举行茶话会庆贺中国女排再次夺魁》,1982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③ 《打出一股气来,全面开创新局面》,《新华日报》1982年第9期167页。

家、一个民族的振兴非常重要。

影片《人到中年》引起强烈共鸣

《人到中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制的彩色故事片,影片根据谌容的一部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我国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局面。中年知识分子成为承上启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热爱事业,勤奋工作,尽管收入菲薄,生活窘困,但他们不计报酬得失,任劳任怨,一如春蚕吐丝。

《人到中年》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影片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年过40的眼科大夫陆文婷,她在肩负工作、家庭两副重担下,超负荷运载,终至积劳成疾。她成天从早忙到晚,照顾两个尚年幼的儿女,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尽量多承担家务,最重要的是她还心系工作,白天看病人、做手术不说,晚上还要经常察看病人的情况,就在病倒的当天上午,她还一连做了三个眼科手术。

她和丈夫的生活又是那么艰难,房子小得只能摆下一张三屉桌,晚上孩子看完书她再看,没有时间做饭时,儿子上学只能买一块冷烧饼充饥。

影片还描写了一对学有专长的中年夫妇为求得更好的发展离开祖国,临别时留下“我们从此将成为孤客”的慨叹,并发出了“我们还要回来的,我们一定回来的”喊声,表达了身在异国的知识分子对祖国不舍的深情及作者对其离去既同情又无奈的态度。

影片勇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触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当时知识分子尤其中年知识分子的心中引起强烈共鸣,致使许多观众在看到影片中陆文婷病了,人们争相看望她时,激动得流下眼泪,唏嘘声不绝于耳。这也正是对许多默默无闻、刻苦钻研的中

年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就在1982年,有两位中年科学工作者蒋筑英、罗健夫正是因为工作刻苦,条件困难,积劳过度而病逝。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如此困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在这之后,有关领导部门,一步一步地加大了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步伐。

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

“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同志的临终嘱托,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设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项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本年,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东方》、《李自成》第二卷、《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六部作品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历来拥有很多读者。长篇小说容量大,描写生活可以写得较广、较详、较细,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的变化。粉碎“四人帮”以后,先是诗歌、报告文学起了带头作用;接着是短篇小说崛起;近年来,中长篇小说大量涌现,仅1981年就超过一百部,成果丰硕。小说涉及的题材不断扩大,作家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角度有许多新的开拓和突破,风格和表现手法也有所丰富,更加多样。“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加入长篇小说的创作行列,使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增添了朝气。

著名文学家巴金致信“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作品能够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作家写出的美好的感情、美好的形象,更是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青年的心灵。所以,好作品就是榜样,就是力量。这是作家的